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朝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池月山云 / 文史随笔 / “零余子”献疑——游修龄、曾雄生两文读后 (附丁颖文二)

“零余子”献疑——游修龄、曾雄生两文读后 (附丁颖文二)

2005-04-21 李根蟠 作者提供 点击: 1506

[“零余子”献疑——游修龄、曾雄生两文读后 \(附丁颖两篇文章\)](#)

“零余子”献疑

——游修龄、曾雄生两文读后

(附丁颖两篇文章)

李根蟠

游修龄先生、曾雄生先生和我关于苏东坡《酬刘柴桑》诗的讨论已经有几个来回，大家都认为诗中“红薯”是薯蓣属的物种，但对该诗第五六句有不同理解，主要涉及“红薯”的收藏和食用方式问题。

读了游修龄先生《谈“零余子”并答李、曾二位的读后感》后，增长了许多知识。游先生指出：“现在的栽培条件下，若雨水调顺，每亩可收鲜山药2400~4400斤，零余子500市斤~1000斤”，即使进行一定程度的疏芽，零余子亩产量也可保持在200~300斤间。这样看来，零余子的产量并不低。我以零余子产量不高为由否定储藏零余子过冬，显然有片面性。正如游先生所说：“吃零余子和吃薯粮，两者可以并存，没有矛盾”。

但是，对肯定“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就是用瓮盎储藏零余子过冬，我仍然有一些疑问。

山药和“红薯”同为薯蓣属植物，但不同种，虽有共同的特性，亦有明显的差异。上世纪二十年代，丁颖撰《作物名实考》，称“我国古代之甘薯，即今之甜薯，其种与山薯（薯蓣）异，与番薯（Sweet-Potato）亦异。本种在我国栽培历史，虽起于距今（百）[千]余年以前，而其种植范围，现仍限于广南一带。”他批评徐光启把中国古书中的“甘薯”混同于“山薯”（按，即山药），“虽知番薯来自海外，而尚未知甘薯与山薯之性状略似，种属实殊故也。”据他考察，甜薯和山薯无论栽培期或分布范围均有所不同。（《农声》第123期）1948年丁颖与戚经文合写的《中国之甘薯——*Dioscorea esculenta*(Lour)Burk.》，再次对此作系统的论述（《中华农学会报》第186期）。这里的“甘薯”、“甜薯”，就是苏诗中的“红薯”，这在丁文中是说得很清楚的。在《中国之甘薯》中，作者根据其实地的调查和观察，对“甘薯”的形态和特征有详细的描述，却没有谈到其叶腋中形成珠芽的现象。

《海南植物志》第四卷（广东省植物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77年）收录了薯蓣科薯蓣属植物11种，其中有“甘薯”（别名甜薯）（*Dioscorea esculenta*）、“零余薯”（别名黄独、黄药子）（*Dioscorea bulbifera*）和“薯蓣”（别名山药）

（*Dioscorea opposita*）。“薯蓣”条下明言“叶腋间常有零余子”。“零余薯”条下亦明言“叶腋内有球形的零余子”，“块茎和腋生的零余子有毒，味苦且辣，食前须经去毒处理”。“甘薯”条下则无此类描述。

因此，我很怀疑“甘薯”在生长过程中是否也会形成许多足以作为过冬粮食的珠芽——零余子？我没有见过甜薯，对它也没有更多的了解，不能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但，这起码对我来说是尚待证明的事。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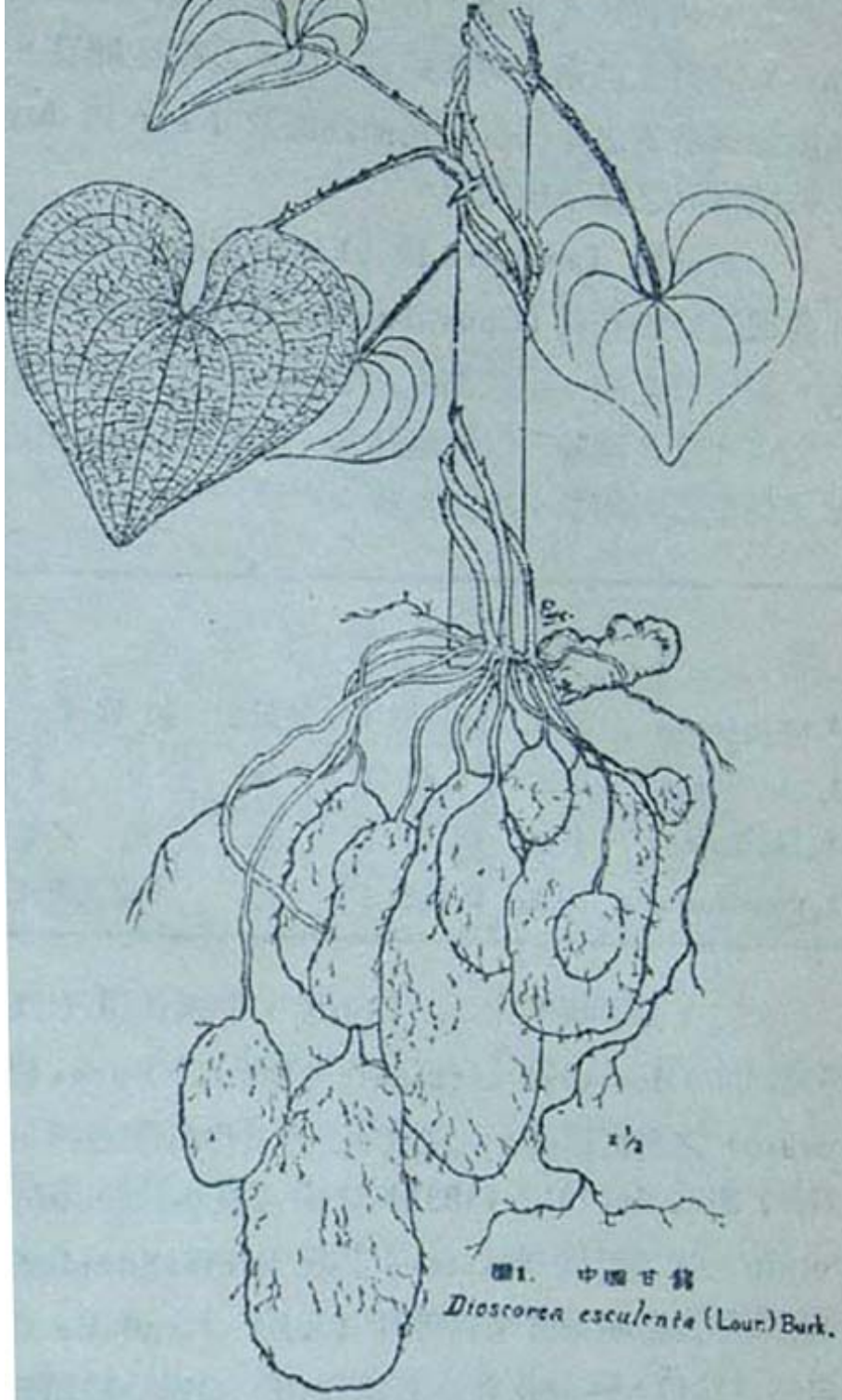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海南先民对甘薯的收储食用方式，最早的确切记载是西晋稽含的《南方草木状》：“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囤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在苏东坡生活的北宋时代，情况是否仍然如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苏东坡说：“海南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苏东坡年谱》元符元年戊寅引《记薯说》，《农政全书》和《广东通志》都引用了它）。他在《和（陶）劝农六首》诗序中又说：“海南多荒田，……所产秬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诗中谈到“芋羹”“薯糜”。从这些记载看，宋代海南人主要不是直接吃蒸红薯或烤薯块；也不是食用零余子（宋代海南人是否食零余子，未见明确记载，即使食用也不可能普遍，而且，大概不会直接用零余子做粥。现在市场上间或有卖零余子——山药豆的，虽然并不需要去毒，但它比较细小，一般是蒸熟后剥皮食用，比较费事，作为粮食，远没有利用薯蕷属植物块茎方便），而是用“薯粮”“杂米作粥糜”，“蒸晒切如米粒”的收储食用方式应是延续下来的。所以，《广东通志》卷52引苏东坡的话径作“海南以薯米为粮，几米之十六”。

《南方草木状》这条史料，西晋以后到清代，一直被人广泛引用。清代吴震方

的《南越杂记》、屈大钧的《广东新语》都提到“甘薯”（甜薯）的这种收储食用方式。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丁颖、戚经文的《中国之甘薯》仍有如下之记载：

“（甘薯）自珠江西江迤南，西至高州、钦廉及广西南边，南至雷州、琼崖，仍为春秋期间之普通旱作物。……至成熟收获之量多者，仍切晒仓囤，与古代同。”可知历代转述《南方草木状》者，乃反映甘薯收储食用方式延续之实况，并非只是作文抄公而已。

甘薯的这种收储食用方式之所以千余年延续不变，绝非偶然，这是海南等地的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适应甘薯的特性和当地自然条件而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之所以在食用甘薯前作如此处理，我想，一是防腐，二是便藏，三是保持风味，四是便于长期随时取食。讨论宋代海南人收储食用甘薯（甜薯）方式，无疑要充分考虑这些经验。撇开这些记载另立新说应十分慎重。

具体到苏诗的第五六句，诚如游修龄先生指出的，瓮盎可以储藏零余子，而不宜储藏薯块。但薯块加工成“薯米”（薯粮）以后，却是很适合用瓮盎储藏的。游修龄先生的文章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白玉延即山药是苏轼的自注。如果“穷冬出瓮盎”吃的是薯粮，白玉延也是薯粮，变成诗中重复两次提到吃薯粮，却没有提到吃零余子，是没有完整理解全诗。我觉得这里可能存在某些误解。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薯粮”是甘薯加工后的专称，山药不采取这种加工方法，是否也称“薯粮”？如上所述，山药和甜薯（红薯）是两个不同的种。则苏诗也可以解释为：海南红薯的风味不亚于以至胜过淇上的白山药。从当时薯粮（薯米）仍然是海南的主粮之一，而零余子未见记载看，后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至于“磊落胜农畴”句，“磊落”形容其众多貌，苏东坡是在庭院栽种“红薯”的，而收获不比大田差，故曰“胜农畴”。

曾雄生先生说，红薯可以留在野地里随吃随掘，这诚然十分简便“理想”，如果行得通的话，我想海南等地先民是不会如此的不惮烦、千余年如一日地“蒸切晒收”的。作物生长期间和停止生长以后显然是不一样的。前者自身有防止腐败的能力，后者一般丧失了这种能动的力量，需要采取人工保护措施。成熟后的薯块短期留在地里是可以的，长期则难免腐烂受损，这恐怕不需要作繁复的论证。至于曾文又立新说——苏东坡是利用瓮盎进行山药的盆栽，我就更疑惑了。宋代仍然如此荒凉、用来作贬谪罪臣之地的海南岛，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实行这种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无论如何，要证成此说，需要拿出起码的证据来，否则，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假说”罢了。

在这里，我还需要作自我批评。在仓促成文的《也谈“红薯与紫芋”》中，由于我的粗心大意，在批评蒋星煜把“山芋羹”当作番薯羹的同时，竟说游修龄先生主张以“山芋羹”为山药羹。其实，游先生在文章中已经明确说过：“到宋时则是芋芋的同物异名。”这个错误实在有点离谱。虽然游先生宽容地没有公开点出我的错误，而我是不能不自责和引以为戒的。

李根蟠2005/4/21

责任编辑: echo

[丁颖：《甜薯》（《农声》第123期，1928）](#) »

--文章内容列表--

G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